绪　论

一、特有的兵学现象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它们分别是《易经》、《老子》、《论语》和《孙子》。《孙子》作为一部兵书，能够与《易经》等著作一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成为民族文化的典范之作，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孙子》一书产生于春秋末期，在其后 2500 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非但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从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相反地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时至今日，孙子的思想乃在诸多领域发挥着作用，《孙子》研究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分析这一现象，对于正确认识《孙子》的地位和价值无疑是必要的。

《孙子》一书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从兵学的角度来看，《孙子》在总结以往兵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战争实践，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精美恢宏的兵学体系（即军事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兵学的主要内容，框定了后世兵学的发展方向。正如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茅元仪所指出的那样：“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① 意思是：对于前人的优秀兵学成果孙子都充分地继承下来，而后世谈兵者也不得不继承孙子的学说。应该说，中国兵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所发展，但在整个古代都未能突破孙子所构建的兵学体系框架而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伴随着西方军事思想的引进方告结束。因此，后世谈兵者，皆以孙子为宗，对《孙子》一书进行注释、校勘、通解者历代均不乏其人，据不完全统计，凡留下姓氏的注者便达二百余家，存世著作达四百余部。以《孙子》揭示的兵法原则来指导战争的例子更是史不绝书，俯拾皆是。可以说，对《孙子》的运用和研究与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是相始终的。《孙子》被尊为“百世兵经”，孙武被尊为“兵学鼻祖”，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产生于丘牛大车时代的《孙子》对于火器时代乃至于核时代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积极防御理论到我国现行的战略方针、作战条令，都无不留有孙子思想的深深印记。

《孙子》不仅对中国兵学影响深远，而且走出国界，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早在盛唐时期，《孙子》便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的战国末期以后掀起一场研究热潮。之后，《孙子》又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国，并出现了不少注

① 《武备志·兵诀评》。

疏之作。1772 年，法国神父阿米奥特将《孙子》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开始了《孙子》在欧洲的传播。随后，1860 年出现了《孙子》的俄文本，1905 年和 1910 年分别出现了英文本和德文本……至今，《孙子》已以近 30 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随着《孙子》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军事家频频运用孙子的思想来研究军事问题。从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到柯林斯的《大战略》和布热津斯基的《运筹帷幄》，都明显地可以看到《孙子》影响的痕迹。甚至美国 1982 年版的陆军《作战纲要》中也直接引用孙子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胜，不贵久”等名言作为警句和概括。这些现象说明，《孙子》一书在现实的军事斗争中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其中的某些观点，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强调慎重对待战争和控制战争的思想，注重联盟战略的“伐交”思想等，由于契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愈加显示出它的价值。

《孙子》是一部兵书，但其影响又绝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孙子》在非军事领域的运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白圭便运用孙子的思想来经商并获得了成功。[①]这是《孙子》用于经商的最早记载。相传为唐代国手王积薪所撰的《围棋十诀》也明显地留有借鉴《孙子》思想的痕迹；产

① 《史记·货殖列传》。

生于北宋的《棋经十三篇》则是仿《孙子》十三篇而著的围棋理论著作。医学上运用《孙子》，最早始于《黄帝内经》。其中的《灵枢》篇中有“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的话，显系由《孙子·军争篇》之“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演化而来。系统论述运用《孙子》于行医的理论著作是清代名医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文中，徐大椿将战术类比医术，借鉴《孙子》的用兵原则提出了用药治病的十种方法，颇有见地。最后，他还感慨地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孙子》在非军事领域的运用研究至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高潮。50 年代，日本出现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其影响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了经济领域《孙子》研究的热潮。此外，人们还从哲学、医学、体育竞技、系统科学、决策学、心理学、语言学、数学、预测学、行为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孙子》，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孙子》作为一部兵书能够在非军事领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它是一部舍事而言理的著作，将军事领域中的具体原则高度提炼，上升到哲理的层次，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例如，当我们说“知彼知己”时，已不再仅仅视之为战场决胜的先决条件，而把它看成是做任何事都应当遵守的一般原则。诸如此类的命题在《孙子》一书中可谓比比皆是。经过数千年的时间，《孙子》的思想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不论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点。

总之，《孙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乃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军事著作都难以企及的。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孙子》能够也必将对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时代呼唤孙子学

打开 INTERNET （国际互联网），在“信息战”一项的网页上，赫然竟是孙子的肖像和《孙子兵法》的名言。① 毫无疑问，《孙子》这部古老的兵书已引起人们日益广泛的重视，并将最终与现代战争“接轨”，在 21 世纪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将《孙子》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使之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要求。

不可否认，经过历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经历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全面兴盛时期，《孙子》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孙子》的普及和运用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果大多还局限于《孙子》本身的考据、正义和阐释以及《孙子》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运用等几个方面。应该说，作为《孙子》研究的

①张琴：《孙子兵法》与信息战，解放军报 1998 年 12 月 29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基础工作，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今后，《孙子》思想的普及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但从学术研究来看，从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孙子》研究要走向深入，要服务于时代，就必须走出新路子。

正如“红学”的建立推动了《红楼梦》研究的深入，“易学”的建立导致了《周易》研究的兴盛一样，《孙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同样有赖于孙子学的建立。1989 年，在“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已故学者许保林先生提交了“建立‘孙子学’刍议”的论文，发出了建立孙子学的倡议。文中指出，《孙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可以与儒家的经典著作相媲美；建立孙子学已经具备了雄厚的基础和充足的条件。在此之前，杨丙安、陈彭也以“孙子兵学源流述略”为题，撰写了学术文章，对中国历代《孙子》研究的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介绍。① 称“孙子学”也好，“孙子兵学”也罢，都是指以《孙子》一书为基础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本文采用许保林先生之说，只是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兵学”概念相区别而已。

那么，何为孙子学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界定：“孙子学”，简称“孙学”，是围绕《孙子》及其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它包括《孙子》产生的历史渊源、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考据、对《孙子》军事思想的总体把握、对《孙子》版本源流的考辨、《孙子》与传统兵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① 见《文史》第二十七辑。

《孙子》在不同时代的影响及运用等诸方面的内容。建立孙子学的目的，在于将《孙子》研究纳入系统化、专门化的轨道，揭示《孙子》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演进规律，在总结中求发展，求创新。这无疑是将《孙子》研究推向深入，使之适应于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经之路。

继许保林首倡建立孙子学之后，在 1992 年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推出了几篇断代《孙子》研究状况的文章，如田旭东的《孙子在汉代的流传与影响》、于汝波的《宋代孙子学述论》、季德源的《明代〈孙子〉研究概说》、皮明勇的《清代孙子学述论》等，这对于以往就孙子而言孙子，或就某一领域而言孙子的传统研究方法无疑有所突破。1994 年 10 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对古今中外有关《孙子》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极为重要的整理工作。这些成果对于孙子学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门学问，目前孙子学的研究状况与“红学”、“易学”、“通鉴学”等尚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是在于目前学术界尚未能构建起孙子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而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主要动因。

本文题为“孙子学通论”，主要讨论孙子学的历史渊源、兵学体系、发展历程、与传统兵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构建起一个孙子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为孙子学的繁荣尽绵薄之力。

第一章　孙子学历史渊源

《孙子》一书诞生于春秋末期。和任何文化成果一样，它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廓清《孙子》产生的历史渊源，对于正确理解这一兵学巨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春秋时代。这一时期，频繁的争霸战争和不断更新的作战样式为兵学的理论总结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学术下移、思想解放所导致的文化繁荣局面的出现，又为孙子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正是这些，奠定了《孙子兵法》产生的必要基础。

一、战争领域的新气象

西周的文明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礼乐文明。礼是规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行为总则，在军事领域便体现为军礼。军礼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征伐大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周天子手中，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队的规模有严格的限制，依次为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至于无军；发动战争要“不加丧”（不在

敌国国君等重要人物丧期发起进攻）、“不因凶”（不在敌国出现灾难时发起进攻）；交战时要约时、约地而战，实施“偏战”（正面列阵作战）；“不鼓不成列”对待敌方要“不重伤”（不伤害负伤的敌军士卒）、“不擒二毛”（不俘捉头发花白的老人）；战胜之后，仍不能灭亡其国，而是要讲求“存亡国，继绝世”；等等。这一军礼制度在当时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讲，它扭曲了战争领域的自然规律，对兵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西周是军礼制度的鼎盛时期。进入春秋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下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逐渐遭到破坏，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权相互征伐，军礼制度也随之走向衰微。如果说齐桓公迁邢、封卫、救燕之举尚可为人们广泛称颂并有益于其霸业实现的话，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做法则遭到司马子鱼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并成为图霸失败的重要原因，而晋文公之“退避三舍”则完全出于战略的需要，所谓实现流亡楚国之诺言完全是虚饰而已。当然，旧军礼的消亡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在整个春秋前、中期，它的影响仍随处可见。如公元前 569 年，楚国因陈成公去世而取消了进攻陈国的计划；同样的，公元前 554 年，晋军在进军途中得知齐灵公去世，于是停止前进，班师回国。更有趣的是，泌之战中楚军教战败的晋军如何摆脱困境，反而遭到晋军将士的嘲笑；鄢陵之战中，晋军击败楚军，本可以活捉楚共王，但晋军将士却对他毕恭毕敬，任其逃离战场。至春秋末期，恪守军礼的传统终于被“兵

以诈立”的新观念彻底取代了，“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①]，战争领域因之而出现了崭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军队数量越来越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自春秋中期始，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国、野之分逐渐泯灭，大量“野人”被编入军队，使各诸侯国的军队数量急增。城濮之战，仅晋军就出动兵车 700 乘之多。如此规模，在西周乃至春秋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孙子·作战篇》言称“十万之师”，说明至春秋末期，大国征战出兵 10 万已是相当普遍的事了。

在军队数量增多的同时，军队的成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士兵的成分由以奴隶变为以农奴（野人）为主。由于大量“野人”的编入，徒兵数量急增，再加上因技术进步等原因而导致的战斗力的增强，已呈现出取车兵主导地位而代之的趋势。与此同时，春秋末期的水军也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兵种，在南方吴楚之地尤其如此。军队成分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作战方式的复杂化。

春秋中期以前，车战一直占主导地位。由于战车驰骋的需要，作战往往在平原旷野进行，以堂堂之阵实施正面会战，即所谓的“偏战”。但随着徒兵数量的增加和战斗力的增强，更由于徒兵较之于车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作战方法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迂回、侧击、包

①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抄、设伏、奇袭等作战方法纷纷登上战争舞台，要塞战、城池攻防战等作战样式也初步进入了角色。

就战争指导而言，旧军礼的束缚已成为过去，出奇用诈成为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手段。鸡父之战中的晦日出兵，笠泽之战中的示形突破，使诡诈之道在战场上叠放异彩。

大量使用间谍，以惑敌误敌，更是对旧军礼的彻底否定。越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吴国，十分重要的一条便是采取了范蠡多方误敌的策略。范蠡辅佐越王勾践，采用守柔、韬晦的策略，卑辞厚赂，使吴国终于完全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进献美色，消磨其志；派遣工匠入吴，使其大兴土木，耗费国力；极力怂恿，使之进而北上与齐、晋争雄，走上了穷兵黩武的自我毁灭之路。而越国则秘密发展自己，暗中积蓄力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由弱转强，灭亡了吴国。

春秋中后期，联盟战略的运用也得到长足的发展。郑国能够在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与其出色的联盟战略运用是分不开的。晋文公促成齐、秦与之结盟对楚的局面可谓谋深略高。而至春秋末期，晋之联吴制楚，楚之联越制吴，更是将联盟战略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些成功的实践，对于《孙子》“伐交”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春秋末期，伴随着旧军礼影响的日益减弱和最终消亡，军事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使得原来被扭曲的军事规律得以“反正”，从而为兵学的发展，为《孙子》这部理论巨著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学术下移与思想解放（上）
——天道的反动与战斗的无神论

西周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政治体制的限制，文化乃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品。对于平民乃至于普遍贵族而言，是不具备从事独立学术文化研究的条件的，更不可能著书立说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了。这一特定的文化格局，史称“学在官府”。

自平王东迁以来，伴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微，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社会矛盾激化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极大地调整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导致了新的分化组合，许多原先的贵族便失去了以往的特权，下降为小生产者。这一趋势至春秋末期表现得愈加明显。在这些没落的贵族中，有许多是原来从事文化教育的官吏。他们在失去贵族地位、降为平民的同时，也将文化带到了民间。这样，“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终于被打破了。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学术下移”。对此，孔子曾感慨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① 伴随着官学的衰落，私学勃然而兴。至春秋末期，私人聚徒讲学之风渐盛。鲁国有孔子，郑国有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

邓析，他们都是著名的私学创立者。与此同时，除了官方史籍政典的传播外，私人著述也开始问世。作为“学术下移”的重要结果之一，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出现并开始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些精英脱颖而出，成为诸子学术的先驱乃至创始人。至春秋末期，道、儒两家勃然而兴，早期法家也相当活跃，其他未形成学派的，也各呈异说，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已向人们走来。

学术繁荣的结果，导致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成熟，这正是本节与下节着重讨论的内容。

春秋末期，在中国上古史中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思想受到质疑和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神学以占卜为主要形式。考古学证明，最晚在原始社会末期，占卜业已出现。① 占卜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即认为在自然之外，存在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决定着世间的一切。天与人之间是互相感应的，“天垂象，示吉凶”，即上天通过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将自己的意志垂示给人类；人们只要按上天的垂示去办，就可以趋吉避凶。形形色色的占卜便是沟通天与人之间桥梁。

占卜是以断难决疑的姿态出现的，正如《周易·系辞》所说的那样：“天下无疑，何卜乎？”占卜现象在古代中国社会是相当普遍的。“自古圣王将建国授命，兴动事业，

①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卜骨出土于河南淅县的下王岗遗址，属距今约 5000～7000 年以前的韶仰文化时期。

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① 在古人的心目中，占卜的结果是相当灵验的，“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②.

占卜在上古社会之盛行表现在诸多方面。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为龟甲，骨为兽骨。所谓甲骨文，便是指写上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迄今出土的殷商时期的卜龟、卜骨便达 15 万余片。作为专司占卜职业的“巫”，在上古统治集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占卜活动的盛行还表现在有关占卜的著作相继问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至今仍广泛流传的《易经》便是现存最早的占卜学名著。据文献记载，早在《易经》以前我国便已经出现了有关占卜的著作。③ 这显然比其他著作的出现要早得多。

军事领域是占卜十分盛行的领域之一。殷墟卜辞中有

① 《史记·龟策列传》。

②《周易·系辞下》。

③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世传，《连山》为伏羲所作，《归藏》为黄帝所作，《周易》为周文王所作。另一种说法是，《连山》为夏朝之《易》，《归藏》为商朝之《易》，《周易》为周朝之《易》。三《易》之成书与作者虽无定论，但它说明占卜著作早在远古时期业已问世。

大量关于用占卜进行军事决策的记载：

丁丑，王卜，贞，其振旅。

己巳，卜，争贞，比伐土方。

据统计，《史记·天官书》共记载了星占例 321 款，其中涉及用兵的有 142款，占 44.2%。商朝以卜为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① 商周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了春秋时期，以占卜决定征伐之事仍屡见不鲜。公元前 655 年，晋献公攻打虢国，便是根据星占的结果来决定出兵时机的。② 公元前 635 年，晋国在考虑是否出兵支持周天子时，晋文公便“使卜偃卜之”，结果是“大吉”；接着，又令卜偃“筮之”，得到“大有”和“睽”两卦，仍是“大吉”，于是决策出兵。③

占卜的产生和盛行，反映了先民们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是感到在自然面前十分渺小，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探求自然规律，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占卜在走向鼎盛之时，也便孕育了自身的反动因素。在占卜学经典著作《易经》中，便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判断

①卜，本指以烧灼龟甲或兽骨，通过观察其裂纹来判断吉凶的占卜方式，在商以前相当盛行，是渔猎文化的产物。筮，系以一定数量的蓍草之茎，通过特定的方式立卦，并进而根据卦辞来判断吉凶的占卜方式，反映了周代我国已由渔猎向农业文化过渡。

②《左传·鳌公五年》。

③《左传·鳌公二十五年》。

的因素。这些思想一旦从神学的襁褓中脱离出来，便成为经验决策兴起的内在动力和合理内核。当然，占卜毕竟是神学的产物，这种形式的存在对于决策思想的发展无疑地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只有冲破神学的牢笼，才有可能赢来真正的思想解放。

春秋末期，伴随着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发出了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而孔子则“不语怪、力、乱、神”[①]，这些都说明神圣的天道在春秋末期思想家那里已受到了质疑。《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晏子关于论述天道的记载：“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焉，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公悦，乃止。”晏子反对举行禳补仪式，认为天象与君德是不相干的，实际上已含有对“天人感应”思想的质疑了。子产则走得更远，明确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著名论断。[②] 既然天道与人道毫不相干，那么也就无所谓相互感应了，这样进行占卜便是毫无意义的事。尽管他们对天道的否定存在着不彻底性，也未从理论上给出足够的论据，但宛如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闪电，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① 《论语·述而》。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军事领域同样出现了反天道的精神。一次，楚国的公子心率军与齐人作战。时有彗星出现，柄（即彗尾）指向齐国的方向。按照星占学的理论，作战时彗柄指向的一方便会获得胜利，因此有人建议公子心不要与齐人交战。公子心回答说：“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次日交战，楚军大获全胜。① 在这里，公子心对传统的占卜理论采取了近乎嘲弄的态度。

春秋末期出现的反天道精神，无疑地对孙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贵的是，在这场反天道的斗争中，孙子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其彻底的反天道精神是那些可以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孙子·用间篇》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表现出彻底的唯物论精神。不仅如此，孙子在彻底否定天道，摈弃占卜这一决策形式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经验决策的转变。他所提出的在“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基础上，通过对敌我双方诸因素综合比较来预见胜负，并进而进行决策的“庙算”理论，标志着以经验判断为主的战略决策思想的成熟，在决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①《尉缭子·天官第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